

教育的职场价值与教育不平等

——中专与普通高中之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对比研究

刘精明¹ 张丽²

(1.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084;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教育不平等的方式是复杂的。本文利用1990、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对照分析中专与普通高中两类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的家庭背景影响的变化,从教育的职场价值角度对教育不平等变化过程提出了新的理解。如果一种教育形式的职场价值出现变化,该教育场域中的机会不平等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教育的职场价值降低,机会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程度也会降低。但是,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是阶层间社会领域不平等的一种持续性反映,阶层相对优势总会以种种形式体现出来,某些教育领域的教育竞争之所以下降或消失,就在于阶层间的主要争斗场域向其他更有价值的教育形式转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专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出现持续锐减的时候,该类教育的阶层不平等也趋于相对缓和,但与此同时普通高中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却较大地增强了。

关键词:中专;职场价值;教育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8)01-0010-14

DOI:10.14138/j.1001-4519.2018.01.001014

一、研究问题

消减教育不平等、促进教育公平,已成为我国政府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揭示教育不平等产生的社会根源,探讨各类教育不平等的形成和变化机制,也成为许多教育社会学研究者的共同话题。就这一讨论主题而言,学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围绕这一研究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传统,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结论上,教育扩张是缩小还是扩大了基于家庭阶层背景方面的影响,也出现了较为广泛的争鸣。

教育扩张缓解了教育资源供给紧张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确实在某些层面上较大程度地缓解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各阶段教育领域一直持续推行着不同的扩展教育机会政策,这对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机会分配、教育选择方式等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初等教育机会的扩展在改革之初便已开始,到2000年时我国已实现基本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展始于1999年,特别是在1999年至2002年间,高校在校生人数逐年递

收稿日期:2017-12-21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演进趋势研究”(10ASH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教育公平问题的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07JJD840198);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研究项目后期支持项目“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光明的前途’——对中国学生国内和国际迁移的比较研究”(71461137004)

作者简介:刘精明,湖南益阳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定量方法;张丽,湖南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自闭症儿童教育。

增速度几乎都超过 20%，分别达到 19.86%、36.1%、29.31%、25.63%，随后增长速度虽有减缓，但招生规模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且有缓慢增长。^①

基于机会供给量的增加而产生的教育不平等变化的解释，已形成了多种研究框架和理论假设。但作者认为，教育扩张在各教育层次上的非同步性不仅影响到教育机会数量的变化，也影响到各类教育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价值。经济学供需理论告诉我们，当某种资源从稀缺变成饱和，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时，它便会贬值。以此而言，教育领域也会如此。教育扩张导致某些教育机会变得充足、获得的难度减小，同时它们本身的“价值”也在下降。低层次教育扩张最先发生，因此这部分教育形式的价值将最先受到影响。而当高层次教育扩张出现时，低层次教育的形式、功能和价值会进一步受到挤压。具体而言，高层次的教育扩张需要投入大量优质的师资、教学设施以及资金，并吸收更多的优秀生源，从而导致各种教育资源在各教育阶段重新分布，原来流入较低阶教育领域的优势资源以及生源都有可能进入较高教育场域。同时，高阶教育形式的扩张促使人们提高自己的教育期望去追求更高的教育文凭，从而人们对低阶教育形式的选择也相对减少。这就引发了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即在教育价值的变化过程中，人们的教育选择是如何变化的，它们对教育不平等产生什么影响？

对学生和家长而言，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教育价值的变化就是其在劳动力市场上作用的变化。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和训练能够提高劳动力价值，为劳动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提高人们的就业适应性，教育投入的差别正好是人们收入差别的合理解释。上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人力资本理论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与职业的关系，充分肯定了现代社会中教育与经济的密切联系，指出教育对劳动就业的价值是教育整个价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将教育看成是人力资本投资，不管是社会收益率还是私人收益率，投资的成本和效益均存在正向关系。然而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经济衰退的出现，劳动生产率下降、文凭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力资本理论预测的繁荣景象并没有实现。在此基础上，各种劳动力市场理论相继出现，它们认为教育对于个人而言不仅是提高生产能力的一种手段，更是个人实现自己职业期望的一种途径，或者说教育投资仅是一种为了保护个人现有职业分配机会的防御性支出。劳动力市场理论不仅表明了教育对个人求职的重要性，更指出了由于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涌入劳动力市场，各种就业岗位普遍对求职者提高了教育要求，例如，本来小学毕业生胜任的职务，现在由中学毕业生代替了，本来中学毕业生胜任的职务，现在由大学毕业生代替了。这样，当高学历就业者急剧增多时，较低教育水平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价值必然受到影响。

以此来看，国内高等教育机会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 5、6 年时间内的迅速扩张，也势必对较低阶段教育职场价值产生挤压效应。由此，根据人们的教育投资决策和选择偏好，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当一种教育形式的“职场价值”发生变化时，基于地域、阶层、性别以及其他社会区隔性因素对获取该类教育机会的影响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简略地讲，教育的职场价值是如何引导人们调动不同资源来竞争相应的教育机会的？其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又会发生何种相应变化？

二、中专教育的职场价值及其变化过程

本文试图以中专教育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教育职场价值的变化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中专教育可能是我国教育扩张发生以来，价值落差最大的一种教育形式。作为一种中等职业教育，中专教育虽有一个良好开端，却也难逃“非主流”的命运。它从兴办之初高高在上的地位教育转变到如今无人问津的局面，期间经历的大起大落集中体现了我国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职业教育的落寞和无奈。究其原因，既有职业教育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瓶颈，也有在普通教育、学术教育面前，职业教育难以突破的弱势地位，在争取资源和生源方面始终处在下风。中专教育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对象。

^① 此处数据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9~2004 各年数据计算得出。

(一)早期中专教育地位被拔高的原因分析

中专本身是与职业高中、中技等中等职业教育类型并无本质区别的生存教育形式,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政策因素,它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享有了较高的地位。新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大批高中级技术人才,然而当时的高等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无法承担起为经济建设输送充足后备人才的任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从苏联引入了中专这种短平快的教育形式,即初中毕业生在学校接受3—4年的专门技术教育后进入专业工作岗位(另一种是招高中毕业生二年制)。中专教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高水平人才匮乏的局面,中专生挑起了各行各业重建和发展的重任,从而奠定了中专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当时能进入中专的都是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初高中毕业生。

改革开放后,中专延续了其较高的地位。与其他中等职业教育相比,中专教育培养的是中级技术或管理人员以及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而非技术工人、技术农民。^①据1983年调查统计,全国专门人才13904204人,其中,中专毕业生占58.3%。中专生有职称的比例为(中师毕业生因中小学暂未评定职称,故未统计在内):在高级工程师中占0.2%;工程师中占20.7%;助理工程师中占31.3%;技术员中占42.3%。^②1984年由国家计委、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完成的《2000年的中国教育》报告指出,中专生高才低用。各部门中专生中有约1/4在当工人。^③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中专生的定位仍是相当高的。

中专教育不仅强调对技术性和专业性人才的培养,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培养干部的任务。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明确,中等技术教育的整顿和发展要“满足目前国家对技术干部的迫切需要,及时完成为国家培养大量技术干部的任务”。1954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也规定了“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等专业教育的任务在于有计划地培养中等专业干部,以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可见在新中国经济复苏时期,中专教育部分地承担起干部培训的任务。改革开放开始后,中等专业教育仍是培养科技人员和干部队伍的重要阵地。1979年国务院发出《工程技术干部的技术职称暂行规定》指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担任技术干部,见习1年期满,成绩良好,确定为技术员。”1980年教育部《全国中等专业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也指出,“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门化,中专毕业生将是各行各业,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重要来源,他们的政治质量和业务水平与四化建设的关系极大”。而且在这一时期中专还举办了干部专修科、干部培训班,专门培养现职优秀中青年干部。尽管它是针对在职人员的委托培养,但这说明国家认可中专教育具有干部培训的资格和能力。专业技术人员担任领导干部或多或少包含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地位观,是职位与教育等级相对应的教育制度表现方式。将培养干部纳入中专教育的目标意味着,中专生可以通过接受中专教育而拥有“干部”的身份,从而获得较高的职业阶层地位。

在制度的安排和鼓励下,中专毕业生能够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或管理阶层。此外中专实行统招统分的招生就业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中专生的优势地位。该制度规定,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时,地方应准予迁入户口。对广大农村生源而言,其身份实现了农转非的转化,充分反映了中专教育的地位取向意义。与此相对照的是,职业中学从1980年建立之初,从未实行过包分配的就业制度,毕业生是由劳动部门(或劳动服务公司)推荐,经用人单位考核,按专业对口原则,择优录用。技工学校虽实行国家统招统分,但生源均是有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青年。1984年后它开始从农村招收学生,但毕业后不转户口,不转

^①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教育制度文件的规定,技工学校是培养技术工人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高级中学的任务是培养中级技术工人、具有中级技术水平农民、中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

^②李蔺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57.

^③同上,416.

粮食关系,哪来哪去,供销合作社择优录取,实行合同制。

与中专较高的职场价值相对应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就读中专的热情相当高涨,“一类学生上中专,二类学生上高中”是对当时中专招考的生动写照。在一些地区中专录取分数线甚至超过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对于农村生源来说,考上中专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二)中专教育原初价值的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全国性的文件对中专的态度已出现一些变化,如1986年国家经委《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对中专毕业的技术职务做出规定,中专生可担任技术员和助理工程师的技术职务,原则上不具备担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条件。这说明了中专毕业生在工程技术界的定位有所下降。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人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工作岗位的技术含量逐渐提高,专门人才受教育层次不断上移。如果说在80年代中专毕业生尚属稀缺人才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1994年、199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双向选择情况看,研究生和本科生普遍供不应求,而专科生、中专生开始呈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多数单位不愿意吸收中专生至技术、管理岗位工作,认为层次太低,难以胜任岗位要求。上海市在1995年提出,现有各类岗位人员的学历要求在今后15年内应提升一个档次,其中包括,企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起点学历应由中专提升为大专,小学教师的起点学历应由中师提升为高师,护士的学历也应逐步提升为大专或高职,等等。^①与此同时,中专生还面临着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的挑战,中专生不得不把就业期望一降再降,他们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普通技术工人或一线操作工。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有关中专的教育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削弱了中专的教育优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已经意识到,干部队伍过大,中专毕业生的统包统分制度应改为不包分配的办法,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1983年农业中专开始试办不包分配的中专班,80年代末中专招生来源出现了国家任务、委托培养和自费生三种。但是整个80年代中专教育的改革进展缓慢。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改革现有教育体系中的“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此后几年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已相当严峻,往往是积压了好几届的中专毕业生都无法安排就业。199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并轨改革的意见》要求,“1998年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要实行招生并轨改革,到2000年全国基本实现新旧制度的转轨。”中专生从此不再享受城镇户口、“吃皇粮”的优厚待遇。不仅如此,1999年9月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的意见》指出,要“通过调整,淡化中专、职高、技术学校的界限”。李岚清同志在《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报告中也谈到:“中等专业学校要向职业学校的方向并轨、靠拢。”这就意味着中专教育将不再享有任何优势和特权,它已完全成为与职业高中教育以及技工学校教育相同的生存教育类型。

20世纪末我国中等师范教育也正在面临“终结”的命运。1999年3月教育部《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制定的结构层次调整目标是,“从城市向农村、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由三级师范(高师本科、高师专科、中等师范)向二级师范(高师本科、高师专科)过渡。到2010年左右,新补充的小学、初中教师分别基本达到专科和本科学历”。随着21世纪初高等师范教育全面承担起培养幼儿园、小学教师的任务,中师的历史使命即将宣告终结。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已提前完成幼儿园、小学教师的大专化,并积极探索研究生层次的幼儿园、小学教师的办学规律。

同时中专自身的发展也陷入困境。投资少、建设快、培养学生周期短是中专学校的特点,初中毕业生经过3—4年的培训后,既具备普通高中阶段的文化基础又拥有中级技术水平。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时期,这种培养模式尚能缓解中级技术或管理人才紧缺的压力,但在今天它已难以承担起培养中等技术或管理人才的任务。还应注意,近年来绝大部分优秀的初中毕业生都流入到普通高中,中专生生源质量

^①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 上海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若干建议[R]. 1995.

较往年大大降低,有的学生甚至不具备初中毕业水平,以至于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教授他们高中阶段的知识内容,还要为他们补习初中文化,这也决定了中专教育的低起点。此外中专本身还存在办学水平不高、教学内容、方式落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中专发展和中专生的就业。

对于中专教育职场价值的变迁,早年的中专生更深有体会。那些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专生已普遍意识到,中专学历在今天已成为他们获得更高职位、更好工作机会的障碍,因为好一点的工作都要有本科学历。

(三) 中专教育职场价值的变动

本文利用1990和200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了不同时期各年龄群体的中专生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al 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 SEI)^①,结果与我们对中专教育的判断是一致的。表1是在1990年及之前和2000年及之前,所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分别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七类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总的来讲,中专毕业生所达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要比普通高中毕业生高,特别是在1990年这个时点上,中专比高中高出了约22分之多,并且接近大专甚至是本科的水平,分别只差3分和6分。但是,相对于1990年普查时点,2000年中专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下降了8.1分,是下降幅度最大的一种教育形式,它与低阶教育阶段的差距在缩小,与高阶教育阶段的差距在拉大。

表1 各教育水平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变化

教育水平	ISEI 值及其变化		
	1990	2000	2000 vs.1990
未上过学	17.06	24.21	7.15
小学	19.16	25.25	6.09
初中	25.33	28.93	3.6
高中	35.71	37.05	1.34
中专	57.53	49.44	-8.09
大专	60.74	55.32	-5.42
大学本科及以上	63.73	59.90	-3.83
平均	23.95	30.10	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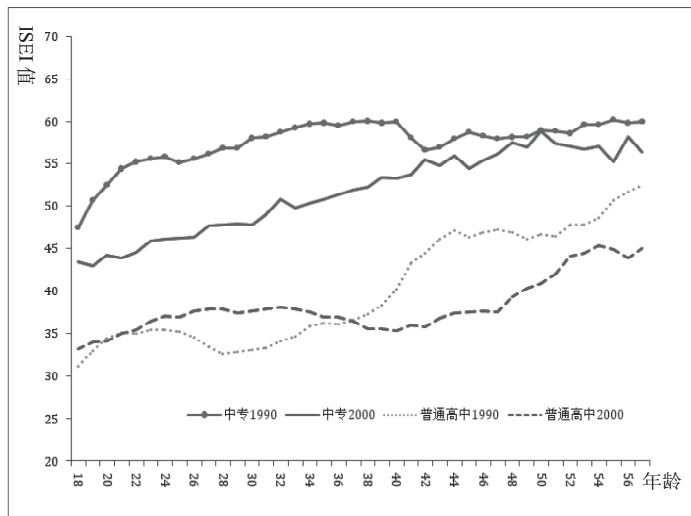


图1 中专生与普通高中生的职业地位变化

图1的横坐标为18至58岁的年龄跨度,纵坐标为社经指数的评分,揭示了在1990年及之前和2000年及之前,最高教育水平分别为中专和普通高中的人群在各个年龄上得分的对比。就中专而言,1990年的水平明显高于2000年的水平,特别是在18岁至40岁的人群中,两个年份的差别最为明显,出生年份距今越近的中专生人群地位下降较快。

就普通高中而言,大约以36岁为界限,当年龄小于36岁时,1990年及以前最高教育水平为普通高中的人群地位不如2000年及以前最高教育水平为普通高中的人群。这一结果较难解释,本文认为从高中教育稀缺性的角度,1990年及以前的高中生地位可能要高于2000年及以前的高中生。但不排除这部分人群具有继续升造的可能性,他们最终的教育水平还不太确定。当年龄大于36岁时,前者和后的地位高低反过来,出生年份距今越远的高中生所享有的地位越高。这是与改革开放前的教育状况相符的,

^①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综合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被广泛用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研究中。本文采用的是ISEI值(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通过将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按国家统计局《中国职业分类代码(GB/T6565-1999)》记录的全部职业转化为ISCO88后,利用Ganzeboom的转化工作而得到的。

当时社会上教育资源匮乏,小学教育普及程度尚不太高,拥有高中文化程度就很难得了。

但不管在哪个研究时点,中专生的社经地位在任何年龄阶段都要远远高于教育水平仅为高中的调查对象。因此至少在2000年前,高中生若不继续深造,其社会地位是不如中专生的。

中专教育之职业价值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对其选择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初中毕业生们开始在中专和高中间犹豫不决。在1998年统包统分政策全面停止之后,读中专已成为学生中考升学失败后的无奈选择。此后几年间全国许多地区和中专校都不能完成中专招生计划,《教育统计年鉴》显示,1998年至2001年的四年间中专全国招生人数逐年下滑,从1998年的166.8万下降至2001年的低点127.7万人。由于招生困难和生源市场的恶性竞争,中专录取分数线年年下滑,^①不少中专校甚至取消分数线,只要有学生来就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普高热的兴起无疑也影响到人们对中专的选择。普通高中教育属于学术教育的范畴,它侧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非对具体职业技能的掌握,面向升学而非就业。因此普通高中是地位教育序列上的一个必经阶段。伴随劳动力市场对求职者要求的提升,人们已经意识到,读高中进而升大学才是保持或取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最可靠途径。近年来普高热一再升温,大量学生和家长已不满足于一般高中校,而是千方百计地挤进重点高中、名牌高中。这与人们对中专的教育选择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教育不平等的变化与教育形式的职场价值密切相关,一种教育形式职场价值的上升或下降,将对这种教育形式的机会不平等产生相应的加剧或抑制作用,但其影响程度又会因家庭资源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

假设1:在教育形式从地位教育向生存教育转变的过程中,由内生性家庭资源所引致的教育不平等并不会降低,这部分不平等在受到教育平等化的冲击时有较强的自我维系功能。而且在地位教育领域,内生性教育资源在外界因素推动下将被强化。内生性家庭资源包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结构。由于这部分资源的性质特征、产生作用的方式很难受到外部环境的作用,因此它对于个人能力形成、学习兴趣的影响有较强的连贯性,它的优势容易保持下来,甚至在不断强化的教育竞争中,得到持续增强。

假设1.1:当中专教育的职场价值降低时,因家庭文化资本(以父母的文化水平为测量)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仍可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假设1.2: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假设1.3:家庭结构对机会不平等的作用也难以受到教育职场价值下降的影响。

假设2:由外依性家庭资源造成的入学机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职场价值变化的影响,教育竞争开始下降。但具体的变化过程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制约。

假设2.1:就中专教育机会而言,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在教育职场价值下降的过程中将有所减弱,但变化程度将依教育扩展速度而定。

假设2.2:普通高中教育中的阶层不平等将不断增强。

前文指出,当中专文凭(职业教育途径)无法满足人们追求较好职业地位要求的时候,该类教育连基本的招生都难以维持,因此中专教育领域的竞争自然是下降的。但是也应注意到我国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及中专)在20世纪80、90年代较低,大约维持在40%—50%之间,如1985年和1990年分别为41.7%和40.6%,90年代末才达到50%左右,即当时约有近一半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2001年全国初中的升学率平均为53%,但城市里的初中升学率达70%—90%不等,有些城市的初中升学率达100%,而农村的初中升学率是30%—40%

^①贾晓燕.四川省建设类中专教育发展思路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0.

不等,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初中升学率甚至不足30%。^①教育机会增长缓慢显然是一种教育不平等的力量,它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的教育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教育不平等的下降可能不该抱有过于乐观的估计。

假设3:在教育职场价值转变过程中,非家庭的先赋因素将最先做出反应。

假设3.1:随着中专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式从“选拔式”逐渐转为“普及式”,由各种非家庭的先赋因素导致的教育机会差异性开始下降。

假设3.2: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普通高中阶段而言,非家庭先赋因素对不平等的影响将进一步被强化。

非家庭的先赋因素最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当平等化力量出现时,由它引起的不平等下降最快。教育职场价值的降低以及教育扩张都是教育平等化的力量,它们能够打破纯粹结构效应,如地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困/非贫困地区的差异等因素,所引起的教育机会分布不平等。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本文选择了1990、2000年我国第四、五次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为分析样本。人口普查数据以个体为样本个案,但保留了完整的家庭户信息,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形成包含有家庭背景信息的人口样本数据,为减少运算量,两个时点的最终样本量分别为当时全国9~25岁人口总体的1.5‰(1990)、0.95‰(2000)。^②

(一)样本选择与样本结构转化

为了减少因生命周期不同而出现的异质性偏差问题,作者采用控制年龄组的方式确定分析样本,即选择不同时点上的相同年龄群体进行教育选择的历时性特征比较。我国中专招生对象年龄和学制的规定是招收初中毕业生,年龄为15~18岁,学习年限3~4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2周岁,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③因此15~22岁年龄群体都有选择中专教育的可能。为了将年龄效应的偏差控制在最低范围内,本文统计了两个调查时点上各类教育的升学率(见表2)。

表2 普查时点反映的各年龄人口的初中升中专、初中升普高比率(%)

年龄(岁)	1990		2000	
	初中升普高	初中升中专	初中升普高	初中升中专
15	2.142	0.179	10.674	2.734
16	7.607	0.887	24.334	7.683
17	16.064	3.179	29.569	12.373
18	21.231	4.423	28.919	13.967
19	23.696	4.286	28.486	13.541
20	23.166	4.203	26.796	13.359
21	23.828	4.203	25.777	14.236
22	22.716	4.096	23.886	13.542

表2显示,1990年和2000年两个时点上的中专和高中升学率到18岁以后才开始稳定下来,因此选用的样本年龄为18~22岁。按照中专学制,两个时点上的样本大致上分别反映了1983~1987年、1993~1997年两个阶段的高中阶段教育获得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前文提到的普查数据处理方式,本文得到的是居住在多代户(multiple generation households, MGHs)中的较完整的家庭信息。18~22岁的部分青年可能因上学、就业等原因将户口

①数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果。

②刘精明. 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5): 101-116.

③20世纪80年代初中招生总数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很高,1979、1980、1981、1982年分别达到64%、84.3%、85.1%和85%。此后国家开始严格限制高中毕业生在中专生中的比例,到1989年时已降至21%,并还在不断下降。

从原地迁出或转为集体户,从而导致家庭背景信息缺失,这部分青年也就无法纳入到分析中来。因此需要用 18~22 岁的多代户推断该年龄段总体的可行性。本文使用了邓中和特雷曼提出的检验方法,即查看不同教育层次的群体在多代户样本中的分布与在总样本中分布的差异^①。如果二者差别较大,则说明多代户样本不能较好地代表总体,否则就证明它是可靠的。

经检验,在 1990 普查时点的 18~22 岁年龄群的总样本与多代户样本中高中教育与中专教育的比例保持了较一致的发展趋势。多代户样本中接受高中教育人群的比例与总样本中比例的差距在 20 岁以后拉大,大约比总样本下降了 4 个百分点。多代户样本中接受中专教育的比例则与总样本差别很小。在 2000 年的 18~22 岁人群中,多代户样本中获得高中教育的比例与总样本的差距呈先迅速拉大后逐渐缩小的趋势,最大时达到约 8 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两个时点的样本中,中专教育的差异在 18、19 岁两个年龄群体中较大,其后两者的差异变得很小了。总体来说,中专教育获得比例在总体和多代户样本之间的偏差较小,高中阶段的差异大了些,这是由于集体户中的高中生比例较高所致。由于本文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中专教育职场价值变化前后教育不平等的变化,因此多代户样本仍是可用的。

(二) 升学模型

升学模型首先由梅尔引入教育机会的分析^②,后经埃里克森和琼森改进^③,可以运用到不同路径的升学研究。埃里克森和琼森模型实质上是多项逻辑回归的一种形式,它在技术上解决了分析多样性教育选择的升学问题。在现代教育系统中,升学路径不是单一的,每一分流环节上都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教育选择,仅研究某一种教育机会的获得已不足以反映教育的阶层差异,因此有必要分析同一阶段上,不同阶层教育选择的差异性。在这里,设立如下由初中升入更高教育层次的升学模型:

$$\ln \frac{P_{ik,t}}{P_{iK,t}} = a_{i,t} + X_{i,t} \beta_{i,t}, \quad k = 1, 2, 3; K = 3$$

k 表示三种升学情况:升入普通高中;升入中专;未升学。X 为引入自变量的向量矩阵,t 表示 1990 年和 2000 年两个不同的普查时点。

为了比较两个时点上自变量效应的差异,在模型中引入全部自变量的与时点虚拟变量的交互效应,交互效应部分的含义可以根据如下公式来理解:

$$\begin{aligned} & \ln \left(\frac{P_{ik,t=2000}}{P_{iK,t=2000}} \bigg/ \frac{P_{ik,t=1990}}{P_{iK,t=1990}} \right) \\ & = a_0 + (a_{t=2000} - a_{t=1990}) + (X_{t=2000} - X_{t=1990}) \beta \end{aligned}$$

(三) 变量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是我国初中毕业后的升学路径。初中毕业后,学生大致面临这样三种教育选择:地位教育取向的普高教育、生存教育取向的中等职业教育和离开学校。其中以离开学校作为因变量的参照类。

自变量的设置分为内生性家庭资源、外依性家庭资源和非家庭的先赋结构三大主要模块。另外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民族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

内生性家庭资源包括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父母教育程度以教育水平转化成的教育年限来表

① Zhong Deng and Donald J. Treiman, "The Impac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no. 2 (1997): 391.

② Robert D. Mare,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5, no. 370 (1980): 295-305.

③ Robert Erikson and J. O. Jonsson, eds., *Can Education be Equalized?*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示(不识字=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缺失值=-1),因此是连续变量。

家庭结构因素被操作化为家庭类型(双亲均在场的家庭、单亲父亲家庭、单亲母亲家庭、双亲均不在场的家庭),祖父母是否在住户中,是否为独生子女,兄弟姐妹数量等四个变量。模型中并未直接加入家庭类型变量,而是以父、母“教育缺失”虚拟变量与“职业缺失”虚拟变量的效应组合来反映家庭类型。住户中是否有祖父母是虚拟变量,有为1,否则为0。独生子女也是虚拟变量,是为1,否则为0。兄弟姐妹数量为连续变量。

外依性家庭资源主要是指父、母亲职业阶层。职业阶层划分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技术/服务型工人、体力工人与农民六个类型,职业缺失作为单独的一类进入模型。其中农民为参照类。

非家庭的先赋结构因素包括城乡、区域、是否为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四个变量。城乡变量区分为省会城区、县市城区、省会城镇、县市城镇、城市郊区与乡村六类。省会是指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县市是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之外的地级市和县,城市郊区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农村地区,乡村则是地级市和县的农村地区。乡村为参照类。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类,西部为参照类。“贫困”程度以地级行政辖区内贫困县人口占全地区人口的比重为测量依据。贫困人口比重为0的地级区域为非贫困地区(0),否则为贫困地区(1)。此外贫困人口比重作为贫困发生率指标也进入到模型中来,它是一个连续变量。

模型还包括年龄、性别、民族三个控制变量。年龄是连续变量,性别和民族分别以女性和汉族为参照类。

五、主要发现

在1990年与2000年两个时点之间,我国中等教育机会数量变化不太大,然而中专教育的职场价值却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对这两个时点的比较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出教育职场价值变化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表3给出了1990年和2000年两个普查时点上中专教育不平等的状况。其中第一、二个模型分别是1990年和2000年的教育获得模型,第三个模型加入了时点与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是对前两个模型的合并。最后两列列出了各自变量效应在高中教育领域与中专教育领域的差异,对差异的显著性检验采用的是沃尔德(Wald)检验。

(一)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持续增强

父、母亲教育程度是影响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职场价值下降,或教育扩张等平等化力量的冲击下,这种影响仍然具有很强的自我维系能力。表3的1990年模型显示,父亲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子女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而非离开学校的概率可增加9.2%,母亲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子女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而非离开学校的概率可增加6.7%。在2000年模型中,父、母亲教育年限各提高一年,儿童进入中专的概率将分别增长12.9%和6.1%。这表明父亲文化程度的影响将进一步强化,母亲的影响稍有下降。模型2000vs1990对父、母亲文化程度对儿童中专教育机会获得作用随时间变化的大小进行了检验显著性,结果表明,相对于1990年,2000年父亲文化程度的影响显著提高(其效应提高了3.4%),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在两个时点上则并无显著差异。

模型1990、模型2000以及模型2000vs1990显示,在高中教育阶段,父、母亲教育程度不仅在不同时点上对教育机会获得有显著影响,而且它们的效应随时间推移被进一步增强。父亲教育年限提高一年使得子女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而非离开学校的概率在1990年、2000年分别提高7.7%、15.6%,母亲的影响分别是5.3%、6.9%。

由此可见,由家庭文化资本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难以改变的,即使在教育职场价值降低的情况下,只要是存在教育竞争,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仍有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一般来说,父亲教育的影响程度一般要大于母亲教育的影响程度。

表 3 两个普查时点间中专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

	Mlogit 模型		2000 vs 1990 中专及普通高中教育机会模型			
			地位取向 (普通高中教育)		生存取向 (中专教育)	
			1990	2000 vs 1990	1990	2000 vs 1990
内生性家庭资源	父亲教育年限		0.074***	0.071***	0.088***	0.034***
	母亲教育年限		0.052***	0.014 [†]	0.065***	-0.005
	父亲教育缺失		0.580***	0.355***	1.015***	-0.172
	母亲教育缺失		-0.249***	0.268***	0.602***	-0.413***
家庭人口特征	祖父母 (户中无祖父母为参照)		0.111**	0.066	0.037	0.073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为参照)		0.271***	-0.115*	0.442***	-0.262**
	兄弟姐妹数		-0.055***	-0.093***	-0.063*	-0.145**
外依性家庭资源	父亲职业阶层 (农民为参照类)	管理人员	0.853***	0.293***	1.579***	-0.007
		专业技术人员	0.827***	0.016	1.388***	-0.122
		办事人员	0.742***	0.377***	1.385***	0.112
		服务人员	0.253***	0.171**	0.618***	0.130
		技术工人	0.285***	0.114 [†]	0.913***	-0.202
		体力工人	0.380***	0.112 [†]	0.687***	0.166
		缺失	0.309***	0.365***	0.576***	0.227 [†]
	母亲职业阶层 (农民为参照类)	管理人员	1.086***	0.097	1.262***	-0.088
		专业技术人员	1.200***	0.290***	1.493***	-0.191
		办事人员	0.983***	0.462**	1.050***	0.162
		服务人员	0.545***	0.029	0.896***	-0.206 [†]
		技术工人	0.413***	-0.076	0.714***	-0.272 [†]
		体力工人	0.432***	0.130	0.790***	-0.294*
		缺失	0.193***	0.200***	0.380***	0.072
非家庭的先赋因素	城乡类别 (乡村为参照类)	省会城区	1.077***	0.242***	1.878***	-0.676***
		县市城区	0.899***	-0.022	1.335***	-0.500***
		省会城镇	0.360***	0.138	0.626***	0.093
		县市城镇	0.363***	0.201***	0.672***	-0.122
		城市郊区	0.082*	-0.082	0.492***	-0.519***
	地域 (西部为参照类)	东部	-0.169***	0.026	0.305***	-0.245**
	中部	-0.153***	-0.210***	0.211***	-0.247**	
	贫困地区 (非贫困地区为参照)		-0.049*	-0.076 [†]	-0.466***	0.190*
	贫困发生率		0.119*	0.071	0.800***	-0.214
控制变量	少数民族 (汉族为参照)		0.066 [†]	-0.191***	0.359***	-0.272*
	性别 (女性为参照)		0.164***	-0.094**	-0.257***	-0.163**
	年龄		-0.002	-0.094***	0.067***	0.019
常数项			-2.637***	1.202***	-7.569***	1.995***
模型检验			N=150197; chi2(66)=28184.74; Pseudo R2=0.187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二) 家庭结构的影响特征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家庭的完整性和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到家庭内每名儿童所获资源的多寡,进而影响到教育不平等。

1. 祖父母因素的影响

祖父母因素对中专教育获得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尚未显示出来,显著度 p 值高达 0.7,这可能与个案数太少有关。本研究中,1990 年调查时点的数据总共包括 577399 个样本,但其中只有 202 个样本接受过中专教育并与祖父母共同居住。在 2000 年普查时点上,祖父母的作用才凸显出来。对于中专教育获得,与祖父母共同居住的儿童的优势比没有与祖父母共同居住的儿童高出 11.7%。此外尽管祖父母因素的不平等效应随时间推移增强了,但是这种变化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498$)。

对高中教育而言,祖父母因素在两个调查时点上都表现出显著影响,相对于家中无祖父母的儿童,与祖父母共同居住的儿童在 1990 年和 2000 年的调查时点上的优势分别是 11.7%和 19.3%。但这种增长未能通过假设检验($p=0.219$),即祖父母因素的效应大小在不同年代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总体来说,祖父母在场有助于儿童教育机会获得,这符合我国传统居家观念,即祖父母与子代共同居住,可以充分起到料理家务、照顾孙辈的作用。

2. 兄弟姐妹数量

不少实证研究指出,兄弟姐妹数量与儿童教育成就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儿童教育成就越低。“资源稀释假设”解释说,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家庭对每名儿童的物质投资以及父母对他们的关注都被稀释了,从而导致儿童教育机会的下降。本文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独生子女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教育而非离开学校的概率高达非独生子女的 1.5 倍(发生比率为 1.556),到 90 年代中后期,独生子女的优势效应为 19.8%,仍然较高。在两个普查时点上,独生子女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而非离开学校的概率比非独生子女分别高出 31.2%和 16.9%。尽管在中专教育与高中教育两个领域,独生子女始终拥有对非独生子女的升学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随时间推移明显下降了,而且其在两个领域下降的幅度是一致的。这种同步性使作者认为,独生子女优势的发挥较少受到中专教育职场价值下降的影响,而是有其自身的下降模式。

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儿童的教育成就呈负向关系。就两个时点上的中专教育和高中教育而言,兄弟姐妹数量每增加一名,儿童初中毕业进入中专学校而非离开学校的概率分别下降 6.1%和 18.8%,儿童初中毕业进入高中而非离开学校的概率分别下降 5.3%和 13.7%。模型 2000vs1990 显示,兄弟姐妹因素的负向影响正被进一步强化。比较它在中专和高中两个领域效应变化的差异,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p=0.2745$),这就说明了中专教育职场价值下降未给家庭规模引发的教育不平等带来太多的影响。

(三)父、母亲职业阶层的影响

大量有关教育分层的实证分析指出,父、母亲职业阶层与子女教育成就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优势阶层的子女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弱势阶层的子女则在教育竞争更容易失败。本文的研究结果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在不同的普查时点上,父、母亲职业阶层均对子女中专教育机会以及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产生显著影响,职业地位越高,其子女就越可能取得这些教育机会。其中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三个阶层的相对优势最大,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中专升学为例,父亲为管理人员的儿童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而不是离开学校的概率是农民阶层子女的 4.852 倍。

模型 1990 和模型 2000 反映出,父辈职业阶层对中专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其对高中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模型 2000vs1990 则显示,在中专教育领域,一些阶层优势随时间推移有了下降的趋势,它们分别是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母亲职业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技术工人、体力工人。其中母亲职业为服务人员、技术工人、体力工人时,这些变化在统计上有显著性($p<0.1$)。在高中教育领域,各阶层优势几乎都表现出上升态势,而且父亲职业中除专业技术人员之外的所有阶层、母亲职业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时,这些上升趋势均具有显著意义($p<0.1$)。由此可见,父辈职业阶层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将受到教育职场价值变化的影响。在地位教育领域(如高中),阶层优势进一步增长,教育不平等被强化。当教育职场价值降低时(如中专),阶层优势也开始减弱,

教育不平等下降。阶层优势的增长往往从较高社会阶层开始,下降则从较低社会阶层开始。

父辈职业阶层效应在两种教育领域中的对比,也再一次验证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阶层优势在不同教育领域的变化方向是相背的。具体而言,当父亲为管理人员、办事人员、技术工人、母亲为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体力工人时,在中专和高中教育领域,它们的变化模式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教育职场价值下降过程中,生存与地位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出现差距加大的趋势。

(四)非家庭先赋因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变迁

非家庭先赋因素所引致的教育不平等最容易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该类型的不平等在两个普查时点之间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二元经济体制下,我国城乡差异始终较大,城镇居民在入学就业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在“城乡连续体”的级别层次中,级别越高的地区教育优势越大。20世纪80年代的中专教育领域中,省会城区相对乡村地区入学的发生比率是6.542倍,其他几类地区对于乡村也具有较高的优势。当时的高中教育领域存在相似的优势等级,但是不同地区相对乡村地区初升高的发生比率均要低于同期中专教育的数据。这意味着由地区级别因素引起的教育机会分配不公在中专领域更为突出,也说明了当时中专教育机会竞争的激烈性。

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同级别地区间的教育不平等仍持续存在,但它们的优势大小发生了变化。在中专教育领域,各类地区相对乡村的优势在原有基础上已经下降了(仅省会城镇一项有所升高),城市郊区的入学水平甚至比乡村地区低2.6个百分点(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相对乡村初升高的优势正在增长,并且超过了它们同期在中专领域的影响程度(省会城镇例外)。城市郊区的初升高优势有下降的趋势,但不显著。

模型2000vs1990显示,对于中专教育机会的获得,省会城区、县市城区、城市郊区三个地区的效应随时间推移有明显的下降。对于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省会城区、县市城镇两类地区的效应随时间推移而显著上升。因此教育职场价值的变化能够影响到地区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状况,中专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减弱,与此同时高中却增强了。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很不均衡,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占据较多的资源,中部次之,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数据分析表明,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专教育机会,东、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拥有绝对优势,发生比率分别为1.357和1.235。普查时点2000年的数据显示,在中专教育的获得上,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差异,模型2000vs1990也表明这种地域效应已经明显降低了。中专数据说明了经济发达情况与教育机会成正向关系。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教育领域,东、中部地区对西部的发生比率分别为0.845和0.858,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到20世纪90年代时,东、中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发生比率变为0.867和0.696,仍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这就是说在教育职场价值更高的普通高中教育领域,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反而拥有对其他地区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随时间推移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众所周知,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全国总体水平,出现这种矛盾局面的原因可能与西部地区高中教育结构有关——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比例严重失衡。1998年国家教委《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写到,“由于各种原因,与东部发达的地区相比,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较大差距。到1996年,西部地区仍有6个省(市、自治区)中等职业学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不足50%;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学校布局、专业设置以及办学形式等方面还不能与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而该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已占到高级中等学校学生总数的56.7%^①。而且近些年来西部地区的中等教育结构进一步失调,表现

^①国家统计局.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7[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

为高中阶段教育中普通高中发展大大快于中等职教,普职比差距加大。因此过高的普高比重与过低的职业教育比重可能导致了数据分析结果与实际不符。我国西部地区的中等教育结构确实有待调整,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要加快发展步伐,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与非贫困地区相比,贫困地区在中专以及普高教育获得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模型 1990 显示,贫困地区学生进入中专而非初中毕业即离校的概率与非贫困地区竟相差 37.2 个百分点,普通高中入学相差了 4.8 个百分点。在 2000 年普查时点上,中专阶段的贫困、非贫困地区差距有所缓解,差距下降到 24.2 个百分点,普高阶段则有所上升,二者差别达到 11.7 个百分点。中专教育不平等的下降与高中教育不平等的上升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再一次证明了教育职场价值的变化影响到非家庭先赋因素引致的教育不平等。

但结合贫困发生率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时,却发现贫困发生率越高的地区,初中毕业生进入中专与高中的机会越大。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贫困发生率 100% 的地区相对非贫困地区的中专以及普通高中升学机会的优势效应分别是 2.225、1.27,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变为 1.797、1.21。但这种下降趋势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1$)。刘精明在研究我国基础教育时也指出,在义务教育阶段,随着地区贫困发生率的上升,入学机会逐步下降,但是初中升高中的模式却与义务教育很不相同,贫困率越高的地区,升学机会反而更大。^①从这个结果,也许可以得出结论,贫困环境大大激发了儿童的教育渴望,通过学习改变自身命运。另一方面,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高失学率说明了,在这些地区完成义务教育也是相对较困难的,面临更多的选拔和挑战,能坚持下来的儿童往往具有较强的学习积极性、学术能力、升学动机以及较好的家庭经济环境,因此贫困地区的初中毕业生获得中专或高中教育机会的比例较高。但是贫困地区初中升学率较低又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之前的解释还是难以说明为何贫困发生率与升学概率呈正向关系。对于此问题,尚有待研究。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教育的职场价值变化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一种教育形式的职场价值下降,将导致教育不平等的降低。但是这种降低是以地位教育领域不平等的加剧为代价的,正如本文数据分析中所揭示的那样,中专领域的不平等已经趋于缓和,然而高中教育领域的不平等进一步增强了。它表明,阶层间的相对优势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体现出来,某些教育领域的竞争之所以下降或消失,是因为它们已经转移到可能具有更高社会地位回报的教育形式当中去了。某种具体教育形式的职场价值的变化虽然降低了自身的不平等状况,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不平等的现状。

此外,一种教育内部不平等的消失实际意味着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正在发生,不同教育形式之间的不对称性正在加剧。当前,包括中专教育在内的中等职业教育几乎没有进入门槛,大部分学校不再设置分数限制,初中毕业生可以在中考志愿中选择填报中专、职高,也可以直接到这类学校报名。这说明中职教育对大众的吸引力已被极大地降低,并已成为“市场化”的教育所严重侵蚀。地位教育序列里的过度竞争可能会导致较多不公,而一种缺乏竞争的教育则很可能因需求动力的严重不足而停滞。

职业教育有普通教育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发展受阻,那么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大量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可能只是单纯依赖工作岗位,先上班后学技术。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培养素质更全面的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学校教育的先进性是工作场所不能比拟的。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不管是从维护教育公平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建设的角度,都有着重大意义。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些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文件,如《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2011)、《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4)。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①刘精明. 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5): 101.

正在酝酿和建设之中,但如何使职业教育充满活力,关键在于如何促进这类教育形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提高,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启示。要做到这点,两个方面的努力必须同时展开:首先,职业教育要灵活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适时调整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以使相关领域技术型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保持一定的稀缺程度,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其次,在白领从业者、技术工人和纯粹体力劳动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工资差距,提高职业技术培养的人力资本回报。

The Occupational Value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equality in Secondary Specialized Education and in Senior Middle School

LIU Jing-ming¹ ZHANG Li²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change way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s complex. Based on 1990 census and 2000 census, this research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ntering secondary specialized education and entering high middle school, in which the occupational value of education is applied to interpret the occurrence and changes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the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may become changeabl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education's occupational value. This means, when the occupational value of some education goes down,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will be reduced accordingly. However, the class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field derive from the persistence in social field. Moreov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dvantaged high class varies, which means the degree of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has decreased or disappeared in some education and it tends to transfer to other educational field of more occupational value.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lass differences will be minimized, when the rewards of secondary specialized education have a sharp decrease, and that of senior middle school will become bigger.

Key words: secondary specialized education; occupational value; educational inequality